

军统第一杀手

陈恭澍 著

Cutthroat

回忆录

亲历✱军统初建时期工作记录

壹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考。

行動。1939年赴臺——至今去世年方及墓葬位置均不可

陳恭澍

之一——專職策劃、指揮、執行暗殺

趙理君、沈醉、王天木

下：軍統四凶、陳恭澍

上海區區長——為戴笠

站長、天津站、第二處處長、

1905年生——歷任國民黨軍統局北平站

亲历✱军统初建时期工作记录

统第一杀手回忆录

壹

陈恭澍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. 1 / 陈恭澍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10
ISBN 978-7-5057-2809-7

I. ①军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军统局—史料 IV. ①D69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1638号

原著作名:《北国锄奸》(作者:陈恭澍)中文简体字版©(书名《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1》)2010年本书由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同意经外图(厦门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01-2010-5989

书名	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1
作者	陈恭澍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规格	700×1000毫米 16开 18印张 200千字
版次	2010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809-7
定价	2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自序

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，也不是纪实文学。

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。我早就想写、早就该写了，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，一直到1977年才开始动笔。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，写了又改，改了再写，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，而且，还多方请教斧正过。于今虽已完稿，仍然觉得不满意，自知笔拙，不善修辞，内容平铺直叙，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，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，至于文字的工拙，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。

完稿前后，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，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，影响到情节发展，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，但并非全般皆然。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，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。这可难为了我，如果歪曲事实，夸大其词，或是添枝加叶、无中生有，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“007”型的神奇人物，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，纵然勉力而为，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。也有人提议：不如请教高明，将原文改写成小说，在报纸上连载，或许更能吸引读者。主意倒是不错，可是谁肯这么做？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。

此外，另有一种见解，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

件行动案，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，血腥气味太重，似有宣扬“暴力”之嫌。这可要说明白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反暴力者”，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。代表政府执行法律，这与党同伐异，使用暴力，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，泾渭分明，切不可混为一谈。

再说这本书的性质。近些年，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，珠玉之论，各有春秋。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、全面性的评述。倒不是自谦，拙著只能触及“二级作为”，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。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。

还有一层，也要交代明白：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，应列为“公文书”类，自有其法定的地位，数据之引证，当然以此为据。不过，据我了解，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。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，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，根本就没有记录。其次是在抗战之前，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，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，再加年代久远，多次迁移，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，乃至造成此一事。因此之故，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，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，必然不尽相同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

本书共分六章，虽各成单元，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。各节中，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，还兼容了情报搜集、情报处理、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，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，或将成为一部“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”的毛坯。

为了调剂行文，也是我的一项喜爱，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，别看都是些鸡零狗

碎，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，即已绝迹绝响，自有价值。

友人曾经提醒我：出版这本书时，不要忘记向“案中人”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。对！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。其实，这也是公事公办，实话实说，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。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。

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，未能一一趋前征询，统此敬祈原恕是幸！

最后，我谨以万分的真诚，感谢刘原深先生。我们是多年的同志、同事，私底下更是莫逆。为了这部书，他所付出的精力、智力与劳力，绝不逊于我。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，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，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。

陈恭澍
1981年10月

CONTENTS 第二章 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

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五月四日，“军统局北平特派员”郑介民先生，连夜传达北平最高军政当局所下的紧急制裁令，并限期一周复命。三日后，由“军统局”所属的“北平站”、“天津站”通力合作，将利欲熏心，泯没民族意识，甘为日寇爪牙的前湖南督军、过气军阀张敬尧，诛杀于北平“东交民巷”六国饭店中。

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■ 45

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■ 52

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■ 63

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■ 70

CONTENTS 第四章 毒杀石友三失利被迫流亡
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冬天，在天津日本租界，我奉命制裁反复无常、朝秦暮楚的过气小军阀石友三。本案的进行，因求功心切，操之过急而遭败绩。其结果：行动目标石友三安然无恙，而实地执行者先鸿霞、老褚二人，却当场失事。

- 争取到对方的亲信作为内应 129
- 枪击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 136
- 操之过急所造成的惨痛后果 144
- 处置失当、步调失常与进退失据 154
- 不敢面对现实作了一次边塞流亡 161
- 像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172

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

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春天，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，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，做个别谈话。

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，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，校长在他办公室内，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，这是第一次。当时，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。

校长着中山装，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，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。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，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，印象最深的是，校长双目炯炯有光，威仪凛凛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、父母存歿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，边问边听，一面核对名册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。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：“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，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。”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，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，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。

这次召见，前后大约有三分钟，也只问过三几句话，因过程简单，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。过后猜想，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、听谈吐，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，至于标准如何，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。

过了三四天，接获通知，在一百多人中，圈定了十四个人，开班受训。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。

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，定名为“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”，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鄧悌兼主任，沈遵晦任秘书。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，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。

这个训练班冠以“特别”二字，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：第一，它没有班址，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，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，就这么凑合了；第二，不规定制服，着中山装、西装都可以，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，因为不穿制服，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；此外，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，也不必按时上下班，迟到或早退，并不会受到干涉。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。至于课程方面，除特约讲授之外，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。

我们所研读的课程，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，如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王阳明全集》、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、《戚继光治兵语录》、《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》等，自行阅读后，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，汇齐后，每周一次，呈送校长核阅，阅后发还，多有眉批。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，我们十四个人中，真能读得“通”的，连三分之一都没有，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。

在受训期间，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，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，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“工字食堂”集体会餐。“工字食堂”在当时是新式建筑，可容纳数百人，布置整齐，收拾干净，一排排的餐桌，横看是一条线，竖看也是一条线，位置井然有序。桌子上铺着白布，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，如要苛求的话，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。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“工”字，所以称为“工字食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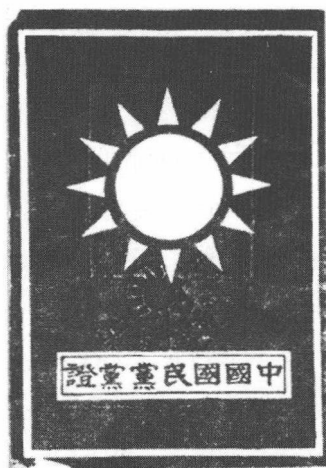
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，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，全体起立、坐下，一声“开动”，然后一齐用餐。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，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。

进食时间，约十分钟，大家陆续放下碗筷，摆放整齐。原位坐正，挺起胸膛，恭聆校长讲话。

在校长面前，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，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，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。能够侃侃而言、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。大家都担着一份心，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，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。

开班后的第二个月，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，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

报告，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，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。校长以毛笔批示：“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”，签署“中正”。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六月间。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（仲锦）保管。不久，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“军余”字党证一张；另外，负责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”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，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“注记”。



► 国民党党证。

这一件校长的批示，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。我持有的那一张，几十年来，天南地北，东奔西跑，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。仔细想想，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，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。

我们十四个人，以我的年纪最小，期别也最低。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，他们是韩浚、陈烈、黄雍、俞墉、吴乃宪、徐会之和刘季文，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、曹勛，第三期的没有，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，第五期的共有四人，是韩继文、夏大康、谢厥成和我本人。

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，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：第一期八十元，第二期七十元，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。其实，那个时候的四十元，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，应该是很够用了。

他们有家眷的，全住在外面，我们几个单身汉，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，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。谢同学能歌善诵，文艺气质特别浓厚，指定的书他不读，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，高兴起来，还要高声朗诵几句，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。

受训到第四个月，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，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，我们都结业离校了，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。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，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，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，又名尚英。

当时，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，同学们也未加谈论。若干年后，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。既称“机密”，虽已年代久远，事过境迁，但

落西山。

剑秋兄提议，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，出了忠义巷不远，有一家本地小馆子，字号是盈丰酒楼，格局不大，只有一楼一底。点了几样菜，叫了一壶酒，吃下来不到两块钱，大家都认为还不错。

自此之后，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，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。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，戴雨农又来了，他看是我输，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，叫我站起来，替我打了几副，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，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。

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，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们告诉我，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，并不明了所司何职。我又不解地追问，他既然在官邸任职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，他不跟了去？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。

后来，我们相处得更熟，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。有一次，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：“恭澍兄，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岂止认识而已，我们俩同连入伍，同排又同班，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。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，我只不过念到中学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，入伍的时候，他连绑腿都打不好，我还取笑过他呢。”

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：“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，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，分手到现在，始终没有再见到过。”

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马上去看他。”

接着我又反问一句：“他真的是到了南京？”

戴雨农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。”

戴雨农之有此一问，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。到后来，他才告诉我，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“新国民党”，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。

再往后，我才悟出来，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，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。

没过多久，校长回京重任艰巨，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，每次来，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。

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，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，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

来，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，转一下就又走了。我猜，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。

此刻，正值日寇侵入上海，我军奋勇抗战的“一二八”。

近一向，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他都会提到：“有报告呈给校长，可以交给我转上去，比较方便。”我每次都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请求，也没有什么条陈，不敢麻烦校长。”我这样说，自己觉得非常得体。其实，我太木头了，他所指的“报告”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，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。

“一二八”事件末了，国民政府迁往洛阳，校长蒋公驻节徐州，戴雨农留在南京。

这一天，戴雨农来找我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，背面还打着火漆。说是“托付”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，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。

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，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，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，其重要可想而知。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。他给我两张乘车证，以及少许路费，行前，他又告诉我：“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，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，也有便衣警卫，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，无论问谁，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，信件送到，请他签收就可以了。”

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，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，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，他翻来覆去看了看，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，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，就叫我回来了。

看名片，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，云南人，后来一打听，原来也是军校同学。

回到南京后，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。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，进门后，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。考究的人家，地上铺的是地毯，他这里铺的是草席。因为地上反潮，没办法，只好穷对付。

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，算是完成了他的“付托”。我看他忙，正待辞出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？”我思索了一下，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。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，无论是才具、仪表，都可以列入第一流，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？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，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。

吸入“军会”与征召受“特训”

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，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。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，就扯开话题，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，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，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，我反复寻思，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。

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，留话给我，说是过几天还会有人和我再谈一次。

此人走后，我越想越不是味道，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，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？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？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？

过了两天，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，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，我们会过面，只是很少来往罢了。他不再兜圈子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现在，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，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，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，以军校同学为基干，力行三民主义，重振革命精神，复兴中华文化，牺牲个人利益，用钢铁的意志，有严明的纪律，服从组织决议，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，共同开创新局。”

他问我：“像这样的组织，愿不愿意参加？”我心里的话：“我本就想纠合同志，搞这么一个组织，可是我人微言轻，根本不够条件，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。”我正想到这里，他又逼问一句：“是否还有什么考虑？”于是，我这才提出反问：“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，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？”易同学告诉我说：“是的，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，也可以解

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，与我亲身所经历的实际情形，仍有很大的出入。这也难说，因为一线之隔，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。其不同之处，以下也将一一说明。

在二十一年（1932）那个时候，我虽系“军会”同志，但我所知道的，也只有这么多了。此外，半是传言，半属猜想，那都不能算数。其最大的意外，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，会有这么高的地位。

下面这一大段，写应征召、受训练的详细经过：

二十一年（1932）五月间，戴雨农找我，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，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。他不作说明，也不加解释，要求我在第四、五、六、七期军校同学中，物色三十名同学，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。此外，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：最好能在一周之内，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数据的名单，给他备用。

只有三天，我就在三道高井、明瓦廊环绕着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”这一带的小旅馆里，征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。其中有穷根究底的，有不求甚解的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，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。不过，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。

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地就照单全收了。总数是三十名，连我也包括在内。

训练班的地址，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，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。该一班址，面积不大，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。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，辟为操场之用。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，新开了一个小窄门。说它是个门，实在像个洞，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。窄门以外，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，连人力车都不能走。

小巷子那一边，相对又是一堵高墙，墙里面才是“洪公祠”。后来，军统局记录中的“洪公祠训练班”，即源出于此。

训练班的正式名称，全衔是“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”。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，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。显然的，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，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。开课、结业或是蒋公莅临时，他们到一到，应卯罢了。

班本部之下，分组或分课，各言其是，我记得是分为三组。郑介民主管教务，戴雨农以“事务”名义主持班务，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。

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，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，皆止步于门外，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。

预先，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，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，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，读毕，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，当场就引火焚化了。全场肃穆无声。

蒋公训话，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，保卫国家，做一个无名英雄。

宣誓过后，正式上课。谈到课程，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，的确是煞费苦心，其最大的难处，就是师资难求。像这种训练，事在首创，并无前例，究竟要排哪些课目？需要哪些教材？到哪里去敦聘教官？谁堪胜任？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，除了摸索着进行外，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。

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“综合采取中、日、德、俄、英、美之精选教材、教官，施以情报业务训练”那些话，美其言而已。

事实上，无论在那个时代，乃至今日的世界，像这一类的教材，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。试想，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在地教给外国人，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？也只能说：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，充其量也只能列为“参考数据”而已。

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：

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，其中包括党义、政治理论、国际问题等。照我个人的想法，这门课程，应由“力行社”的高干们主持才对，可是他们也不来。何以致之，令人费解。

速记——选用“张才速记法”，由张才的传人担任，教得好，最难学。

速绘——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。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“香谷寺画室”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。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“棉湖之役”。

摄影——包括照相机的使用，及暗房显影等，教的人也是名家，想不起是哪一位了。

驾驶——分汽车驾驶、机车驾驶，都实习过，受时间限制，除少数几个人外，大都没有学会。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。

爆破——我们都有点基础，此番等于复习，花样也多了，大家最有兴趣的，是自制爆破罐。崩一声，好开心，也很好玩。

射击——包括各式枪支的分解与装配。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

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，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，就是单学一两样，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“通”字。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，都能建立一个“特务工作”的概念，这也就是达到开训的目的了。

总之，一般同学的心理，并不在于学本领，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。